

“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解读丝路基金相关成果

编者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 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 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解读了丝路基金的相关成果。以下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的答记者问。



问: 本次丝路基金增资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等问题, 融资需求较大,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支持来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丝路基金展现了其优越性和活力, 通过灵活高效的运作模式, 为重要项目融资提供了新鲜血液, 既确保了中长期财务可持续, 也实现了合理的投资回报。

在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 在前期投资过程中, 我们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的资金需求是非常庞大的, 丝路基金在前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项目储备, 未来对资金支持也存在大量需求, 对丝路基金增资有助于发挥其运作模式较为灵活高效的优势, 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另一

方面, 更充足的资金也有助于丝路基金进一步发挥其杠杆撬动作用, 更好地调动沿线国家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 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 分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当然, 增资后的丝路基金仍将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原则,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来源同时, 也将实现较好的资金回报, 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

问: 下一步丝路基金还有什么计划?

答: 我们认为, 未来丝路基金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一是对外大力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丝路基金本身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丝路基金的投资实践,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能够

使参与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形成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丝路基金投资实践的过程, 也是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中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的过程, 通过投资合作, 可以更好地凝聚各个方面的共识。

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 履行社会责任。当前, 多边开发机构和各国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投融资的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丝路基金一直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 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纳入可行性评估和风险管理。通过推进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 有助于维护我国在“走出去”进程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三是与国际、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精诚合作, 彰显和放大国际合作效应。目前, 丝路基金已与 30 多个国家(地区)政府部门建立了工作联络; 与包括 IFC(国际金融公司)、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IB(欧洲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个国际多边机构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与若干重点行业中的中外领先企业建立起了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开展项目筛选和投融资、加强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设立基金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效应日益显著。

问: 丝路基金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答: 2014 年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 这是利用中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体现, 也是中国对国际投融资模式进行的重要探索。自成立以来, 丝路基金依照“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 按照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原则, 不断推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

作和金融合作等项目上的合作。

截至 2017 年一季度, 丝路基金已签约 15 个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累计约 60 亿美元, 投资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洲等地区。此外, 丝路基金还单独出资 20 亿美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

需要注意的是, 丝路基金是一个投资基金。我们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投资, 不是进行单方的资金支持或单方面让利。我们的投资是有商业回报的, 也是可持续的。

问: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 丝路基金在经营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

答: 丝路基金成立以来, 在服务国家战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作方面正显现出一些优势。

一是具有高效的决策机制。丝路基金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中长期投资基金, 在遇到重大项目时, 可以主动快速做出决策, 把握市场机遇, 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实现经营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性。

二是能与已开展的贷款等投融资形成互补。以前我国开展的融资多以贷款为主, 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方式, 可根据地区、行业或项目类型分设子基金, 坚持互利共赢、商业化运作, 可与已开展的债权融资相互配合,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互补。

三是灵活开展联合融资, 发挥杠杆撬动作用。丝路基金通过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等方式开展合作, 既扩展了融资来源, 有助于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也可以更好地降低融资风险。据粗略估算, 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已达到 800 亿美元。

四是发挥中长期投资对项目的支持作用, 为一些建设和运营期限较长、私人资本进入较少的项目提供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比如, 卡洛特水电站和哈翔清洁能源电站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都长达约 30 年, 丝路基金的加入为项目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刘铮 王晓洁)

“‘一带一路’与大西安建设” 高层学术应用研讨会召开

骀铃古道丝绸路, 车马犹闻唐汉风。5 月 17 日, 由陕西省中特理论研究中心、陕西省社科联、西安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一带一路’与大西安建设”高层学术应用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浙江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暨汉唐文学研究院院长李浩,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丝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院长杜跃平,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程玕, 西安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颖科和西安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作权分别主持开幕式和研讨发言。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 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肖云儒,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杨晓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 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颖科, 西北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暨汉唐文学研究院院长李浩,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保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丝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院长杜跃平,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程玕, 西安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颖科和西安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作权分别主持开幕式和研讨发言。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与大西安功能定位; 大西安建设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路径; 瞄准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 “一带一路”的教育科技合作与大西安创新型城市建设等学术应用议题。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一般来讲, 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国家组织经济和配置资

源的中枢, 也是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的枢纽, 同时还是科教、文化、创新中心, 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 并且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陕西主动承担起建设内陆开发开放新高地、建设向西开放重要支点的历史使命, 作为陕西最核心的城市, 西安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 着力构建国际化大都市。

与会学者提出, 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一带一路”使其处于向西开放的最前沿, 自贸区的获批将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这些都将成为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从西部大开发到关天经济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西安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 内陆腹地升级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并承接起东西双向开放的纽带桥梁作用。要跳出城墙看西安, 从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出发, 运用系统性思维搞好大西安规划。要立足全省发展实际, 把大西安与整个关中城市群规划有机衔接起来, 加强对城市新轴线和新中心的研究探索, 努力推动大西安多轴线、多中心发展。目前, 国家中心城市所具有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 使得建设大西安的需求更迫切; 只有把大西安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作为中心城市引领关中城市群发展, 才能从内陆脱颖而出, 实现追赶超越目标。

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颖科表示, 此次研讨会是陕西省社科理论界为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 进一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精神,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 与会专家坚持新发展理念, 突出发展主题, 深化经贸、人文、旅游、文化、科教等领域的学术应用探讨, 汇聚社科智慧, 破解发展瓶颈, 为奋力追赶超越, 实现“五新”战略, 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 引领大西北, 着力打造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提供思想先导、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陆航 舒建军)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提升广东全球价值链地位

■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毛艳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 总结汇聚了各方共识, 梳理了重点领域合作, 探讨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长效合作机制, 为沿线各国推进国际产能和投资合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因此, 相对于以往 WTO 的多边主义, “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更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广东最早实行改革开放,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价值链的低端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其经济是典型的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保持了广东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要素报酬和比较优势的变化, 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广东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市场大幅萎缩, 成本要素变化与外部市场冲击双重因素倒逼广东企业率先“走出去”, 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机遇,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事实上, 从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三年来的实践来看, 企业“走出去”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很多的联动机制。不管从交易数量和金额看, 广东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都位居各省市之首。由此相对应, 在全国民间投资普遍不振的环境下, 广东省民间投资逆势上扬, 2016 年同比增长 13.5%, 远远高于全国民间投资仅 3.2% 的增长。新增投资主要流向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服务业, 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深入开展国际产业合作, 既是现阶段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素配置优化的现实要求, 也是加快塑造广东新型比较优势和提升广东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机遇。

南开大学成为全国首批 获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学府

日前,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申报的“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过现场答辩、专家评审等环节, 最终获批建设, 成为全国首批 7 家中心之一。

据悉, 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 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专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该中心的设立, 是党和国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举措, 旨在进

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研究中心的获批建设, 将有利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更好地阐释经济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赵晖)

广东企业如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通过“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 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 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导向型、技术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按照日本、韩国产业升级的经验,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引进技术、学习、创新,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向上游衍生; 二是将产业向周边国家或地区转移, 通过更广泛范围的产业布局, 充分利用区域合作的价值链或者生产网络来提升地位。笔者认为,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企业“走出去”通过促进进出口贸易、转移富余产能、获得先进技术和稳定资源供给等路径, 可以推动广东产业升级和提升价值链地位。

首先, “走出去”促进贸易出口。进出口贸易是构建多元开放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内容, 广东经济增长对外有着较高的依存度。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销售网点, 扩大广东产品对东道国出口, 可以推动出口贸易增长, 有利于保持广东经济稳健发展。另外, 近年来, 受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贸易壁垒不断增多,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贸易壁垒, 产生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效应, 带动相关产品及服务出口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 进而提升广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 “走出去”转移富余产能。近年来, 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 产业链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广东大量的鞋服、纺织、制衣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是丧失比较优势, 或是虽有比较优势但产能富余。企业积极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 适度转移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及富余产能到工资水平较低、

与国内产能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的沿线经济体, 这是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一方面, 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较廉价的生产要素, 重新获得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 生产利润也可以反馈支持广东本土生产环节向品牌管理、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价值提升。另一方面, 产能转移释放出的资金、人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能够为新兴产业培育和优势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提升价值链地位。

再次, “走出去”获取先进技术。从总体来看, 广东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附加值要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尤为突出。广东产业结构中轻工业特征明显, 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占了较大比重。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 或与发达国家企业组建战略联盟, 以较低成本与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联合开发, 可以打破技术壁垒, 通过技术溢出和转移, 提高广东企业的生产技术,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促进广东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最后, “走出去”稳定资源供给。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大, 个别资源短缺问题越发明显, 广东企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格约束。这就迫使企业改变资源供给路径, “走出去”寻求海外资源供给。现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广东制造业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资源稳定供给对广东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企业“走出去”通过绿地投资或兼并收购方式获得海外资源所有权, 增加广东资源的供给规模, 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资源短缺瓶颈。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关联效应等渠道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在价值链的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开展生产。